

老年学习共同体发展的影响要素及干预策略

于晶 张翔宇 江颖

[摘要]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运用建构主义扎根方法,对典型老年学习共同体案例进行三级编码与持续比较,构建了包含四层系统的影响要素模型:微观系统(长者主体层)以“核心召集人与成员”为核心要素;中观系统(学共体实践层)聚焦“结构、过程、文化”三方面要素;外层系统(组织支持层)依赖“资源与认可”要素;宏观系统(社会文化层)涵盖“政策与文化”要素。基于此模型,应构建系统精准的支持体系、优先保障关键赋能要素、重视情感与关系要素的“软”建设、建立跨部门协同的支持网络,从而推动老年学习共同体从零散支持转向系统发展。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老年学习共同体;生态系统理论;影响要素

[作者简介]于晶(1982-),女,山东枣庄人,国家开放大学(国家老年大学)老年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张翔宇(1988-),女,河北辛集人,国家开放大学(国家老年大学)资源平台中心副主任,助理研究员,硕士。(北京 1000871)(通讯作者)江颖(1978-),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开放大学教育数字化与终身学习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四川 成都 610073)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重点课题“社区学习共同体发展机制与模态分析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BIAA23037)

[中图分类号]G7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6)09-0061-10

DOI:10.13615/j.cnki.1004-3985.2026.09.009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积极老龄化成为影响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社会课题^[1]。在此背景下,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与学习需求日益高涨,推动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一环。区别于传统的老年大学供给导向模式^[2],一种以老年人为主体的、自发或半自发形成的老年学习共同体在基层社区中蓬勃发展^[3]。这些老年学习共同体以兴趣为纽带、以情感为联结、以学习为载体,成为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构建社会资本的重要平台^[4]。与此同时,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发展也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性,一些在专业教师引导下稳步成长,一些能够不断裂变、扩大社会影响,也有一些在短暂活跃后陷入停滞。这种发展差异的背后是

复杂的内外部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目前,关于老年学习共同体发展影响要素的相关研究散见于老年教育学、社区发展与成人学习等多个领域,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局部认识。学者们普遍关注到召集人领导力^[5]、成员参与动机^{[6][7]}、内部结构与文化^{[8][9]}、外部资源与认可^{[10][11]}等因素的影响。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的局限:其一,多数研究聚焦于职业或正式教育场域中实践共同体发展,对以休闲、社交与情感支持为主要诉求的老年非正式学习组织发展关注不足^[12];其二,现有研究仍呈现“零散化”特征,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因素列举阶段或单因素分析层面^[13],缺乏对要素进行理论抽象与系统归类的模型构建,尤其缺乏从老年群体的真实生活脉络与学习经验中“生长”出的、反

映本土制度与文化情境的整合性解释框架;其三,国内相关研究尚处起步阶段,对中国本土情境中制度与文化因素的探讨仍显薄弱。因此,构建一个既能体现层次结构,又能扎根中国社区实践、回应老年学习真实逻辑的要素模型,成为本研究试图突破的方向。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

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的人类发展生态系统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核心的分析框架。该理论颠覆了以往仅关注个体内部因素或直接环境影响的局限视角,提出了一个动态的、相互嵌套的系统层。该系统层被划分为四个层次:微观系统(Microsystem)是个体直接参与和互动的环境,如家庭、学校、同伴群体;中观系统(Mesosystem)指的是微观系统要素之间的联系或关系;外层系统(Exosystem)是个体未直接参与但对其产生影响的环境,如父母工作环境、邻里社区;宏观系统(Macrosystem)则是指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与政策法规。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的发展并非孤立发生,而是个体在特定环境中,通过持续的、日益复杂的互动过程,在生命全程中不断被塑造和重塑的结果^[14]。

将该理论应用于老年学习共同体的研究具有高度的适切性。第一,老年学习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微观系统,老年个体在其中进行直接的互动与学习。第二,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发展并非真空中的产物,它必然受到社区教育机构(外层系统)、国家积极老龄化战略(宏观系统)等外部环境的影响。第三,老年学习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老年学习共同体与家庭之间的互动(中观系统)同样至关重要。因此,该理论提供了一个多层次、整合性的框架,有助于系统地考察影响老年学习共同体发展的各类要素,并探究它们之间的动态关联,而非仅仅罗列孤立的因素。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并

非旨在验证人类发展生态系统理论,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理论透镜,用其“层次性”思想来引导数据的编码与归类,而模型的具体内涵包括各层级的核心要素及其在中国情境下的特殊表现,将完全从质性数据中“自下而上”地涌现和构建^[15]。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从复杂的现实情境中构建解释性理论,因此采用植根于建构主义范式的多案例扎根理论作为核心研究方法^[16]。该方法具有两大优势,高度契合研究目标。第一,扎根理论的自下而上特性,强调理论必须从原始数据中生长出来,而非对现有理论的简单验证。这有助于我们摆脱预设框架的束缚,深入探究影响老年学习共同体发展的独特要素。第二,多案例研究的比较逻辑^[17],通过在不同案例间进行系统性比较,能够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与理论的普适性^[18]。当一个模式在多个异质性案例中反复出现时,其理论解释力就更大。本研究将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流程嵌入多案例的持续比较分析之中,通过“案例内分析”与“跨案例比较”的迭代循环,逐步提炼概念、构建范畴,并最终形成一个经过多重情境检验的理论模型。

(三)案例选择

本研究的场域选择为某市Y区。该区老年教育体系相对完善,老年学习共同体培育工作开展较早且类型多样,为理论抽样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池。遵循理论抽样原则,本研究旨在选取能够最大化揭示现象变异的异质性案例。在对该区46个已认定的老年学习共同体进行初步摸排后,基于“生成逻辑”(行政驱动、兴趣驱动、使命驱动)这一核心维度,并综合考虑活动内容、成立时间、团队规模等因素,最终选取了3个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度研究。其中,行政驱动型共同体(BY)是由Y区成教中心的书法课程班直接转化而来,负责人为中心在职教师,其生成逻辑为典型的“自上而下”行政

引导,组织规范,与教育机构联系紧密;兴趣驱动型共同体(BQ)源于戏曲爱好者在公园、广场的自发聚集,由一位核心人物组织,具有典型的“自下而上”草根生长特征,其活动区域主要在农村,呈现资源有限但内部凝聚力强的特点;使命驱动型共同体(CC)是一个综合性的志愿服务队,从助老助残等公益活动中衍生出稳定的学习需求,负责人是社区能人,其生成逻辑为“使命驱动”,社会服务导向鲜明。这三组案例在生成逻辑上形成鲜明对比,为通过跨案例比较提炼影响要素提供了理想的分析基础。

(四)数据收集

为确保数据的丰富性与多源性,本研究采用了三角互证的数据收集策略。第一,对研究对象进行了28场半结构化访谈,总时长超过30小时。访谈对象包括社区教育管理者、老年学习共同体负责人、核心骨干成员、普通成员以及指导教师。第二,对部分老年学习共同体的日常排练、成果展演、线上讨论等活动进行了12次非参与式观察,记录互动细节、氛围与非言语信息。第三,收集并分析了各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内部章程、活动方案、微信群聊记录、美篇作品集、媒体报道以及Y区成教中心的相关政策文件、项目申报书等实物资料。

三、数据分析与模型构建

数据分析过程严格遵循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流程,并嵌入持续比较的思维。先是进行开放式编码,旨在从数据中提炼初始概念;继而通过主轴编码,将概念聚类并进行跨案例比较,形成核心范畴;最终通过选择性编码,整合范畴,构建起四层级的生态系统模型。

(一)开放式编码:从原始数据到初始概念
通过对所收集到的原始资料的细致研读,

对关键的现象、事件、观点和感受进行贴标签,共提炼出58个初始概念,编码示例见表1。

表1 开放式编码示例

原始资料(引自访谈纪要)	初始概念	初步范畴
“你担任BQ的负责人,你要不组织节目,那就没意义了。你要是组织,就得付出……准备各种糖果、瓜子或菜品,这都得我花钱。”	负责人自掏腰包、负责人承担活动成本、负责人情感与精力投入	核心召集人奉献精神
“咱们老有所乐……特别是去敬老院给老人演出之后,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自己也感觉挺欣慰的,做了一件好事,为社会做了点贡献。”	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贡献感、精神满足	成员价值实现动机
“从那里就分出了几个老年学习共同体,并且还在分,WZ学共体的负责人就是从他那儿出来的。”	团队分裂与再生、骨干成员创办新团体	团体裂变机制

(二)主轴编码:跨案例比较与主范畴构建

通过系统性的跨案例比较,选取多个主范畴,然后检视其在行政驱动型、兴趣驱动型和使命驱动型三类共同体案例中的具体表现、作用机制等,从而揭示不同类型老年学习共同体在关键影响要素上的共性与差异,编码示例见下页表2。

(三)选择性编码:构建扎根理论模型

通过对各主范畴及其关系的反复思索与比较,并结合人类发展生态系统理论的层次性思想,发现一个能够统合所有主范畴、解释案例核心现象的核心范畴: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发展是一个在多层次生态系统中,由多元要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基于这一核心范畴,本研究撰写出一条连贯的故事线: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发展深嵌于一个多层次的生态系统中。在微观系统层面,核心召集人的特质与成员的学习动机构成了老年学习共同体发展的原初动力。在此基础上,老年学习共同体内部的运行结构、互动过程与组织文化形成了中观系统,成为其内生发展的主要引擎。与此同时,这一内生过程持续受到来自社区教育机构、社会网络等外部系统的资源供给与认可支持的影响,这些要素构成了

表2 主轴编码示例

主范畴	行政驱动型共同体(BY)	兴趣驱动型共同体(BQ)	使命驱动型共同体(CC)
核心召集人角色	教师—管理者:负责人既是专业教师,又是班级管理,拥有制度性权威和专业权威,负责课程设计、成员管理和思政引导。	魅力型领袖—大家长:负责人凭借个人魅力、奉献精神(自掏腰包)、人脉资源和组织能力凝聚团队,扮演着主心骨和为大家长的角色。	社会活动家—资源整合者:负责人是社区能人,善于链接各类社会资源,将共同体活动与社区治理、文明创建等项目结合,获取支持。
证据	“我从事教育时间长……基本上我都会按照教学计划安排内容。”	“我的人缘好……要担任柳腔艺缘的负责人,要不组织节目,那没意义了。”	“区里比较认同CC,好多项目也给他了。”
作用机制	通过规范化的教学与管理,快速建立组织框架,保证学习质量。	通过情感投入和个人奉献,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建立强大的内部凝聚力。	通过项目运作和资源整合,扩大社会影响力,为共同体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重要的外部赋能机制。而以上各层次,均嵌入由国家政策、社会文化观念构成的宏观系统背景之下。上述四个层级的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老年学习共同体发展轨迹。基于此故事线,本研究构建了老年学习共同体发展的影响要素模型(见图1)。该模型将影响要素归纳为四个嵌套的层级,系统地呈现了影响老年学习共同体发展的要素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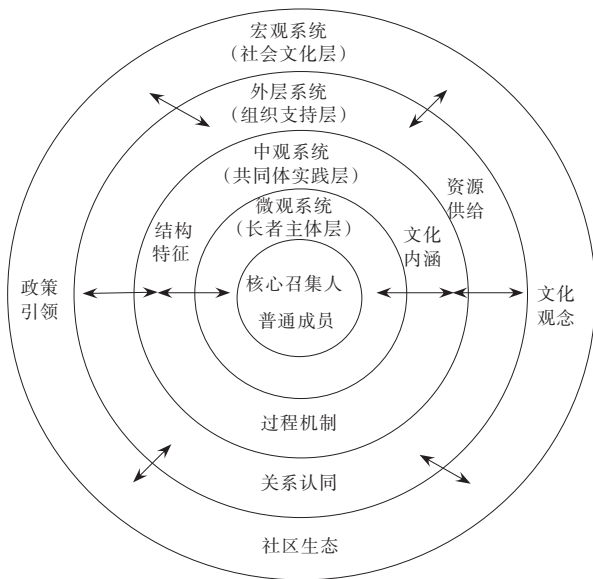


图1 老年学习共同体发展的影响要素模型

四、模型阐释:老年学习共同体发展的影响要素模型

本研究所构建的老年学习共同体发展的影响要素模型由微观、中观、外层、宏观四个嵌套的层级构成,揭示了不同层面要素如何作用,共

同驱动老年学习共同体的生成与发展。

(一)微观系统(长者主体层):核心行动者的动力源

微观系统聚焦于参与主体自身的特质与能动性,是老年学习共同体生成与维系的原初动力层。该层级的核心逻辑在于,无论外部支持如何充分,若无具备内驱力的行动者,老年学习共同体便难以真正活起来。其中,核心召集人与普通成员构成两类关键行动主体,二者相互依存、共同发力。

1. 核心召集人: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发起者与维系枢纽。作为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关键行动者,核心召集人的个人特质与行动能力深刻影响着组织的存续质量。第一,奉献精神与情感投入是老年学习共同体得以萌发与维系的首要情感基础。例如,兴趣驱动型共同体(BQ)的负责人自费支持活动,开放家庭作为活动场地。这种超越功利的付出,不仅解决了初创阶段资源匮乏的问题,更在成员之间形成了组织内部深厚的情感凝聚力。第二,资源链接与动员能力直接决定老年学习共同体可获得的外部支持水平。使命驱动型共同体(CC)的负责人作为社区能人,善于将学习活动与政府项目、社区需求相衔接,为共同体赢得了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第三,领导风格与角色定位塑造着老年学习共同体的组织文化与管理模式。行政驱动型共同体(BY)的负责人因其教师背景自然形成

“教学—管理”双重角色,在带来规范化运作的同时,也使组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自上而下特征。可见,核心召集人不仅是组织的发起者,更是其价值观、运作逻辑与生命力的塑造者。

2. 普通成员:老年学习共同体的稳定基石与活力来源。成员的参与状态和心理承诺是老年学习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第一,参与动机的多元复合性决定了成员投入深度。老年人的参与涵盖求知、社交、健康维护与自我实现等多重需求,构成持续参与的复合动力。第二,情感承诺与归属感是化解组织内部张力、增强团队韧性的关键心理机制。基于认同的高度自愿性投入,使得老年学习共同体在面临资源波动或外部不确定性时仍能保持基本运转。第三,参与的稳定性和持续度是活动常态化开展的前提。稳定的成员构成不仅有助于形成默契的互动节奏,更是组织从浅层聚集走向深度学习的基础保障。成员与召集人之间并非单向的“领导—追随”关系,而是相互塑造、彼此赋能的动态互动。召集人的热情激发成员的参与,成员的积极反馈又反过来强化召集人的投入,形成正向循环。

(二)中观系统(共同体实践层):维系组织运作的内生引擎

中观系统指向老年学习共同体内部的组织架构、运作过程与集体文化,是其实现稳定运行与内生发展的核心引擎。如果说微观系统回答了“谁在推动”的问题,中观系统则回答了“如何持续”的问题。它将个体的热情与动力转化为组织的制度、流程与共识,使老年学习共同体从人治走向机制治。

1. 结构特征:组织形态的稳定性基础。结构要素构成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基础框架,直接影响其运行效率与互动质量。第一,组织规模需与互动深度相协调。多位负责人指出,“20—30人是最佳的规模”。这一判断背后有其深层逻辑:过小的规模难以形成稳定互动,过大的规模

则可能稀释人际联结,使成员从“相识”退化为“照面”。当老年学习共同体规模超过300人时,则需依托分组、分权等结构设计来维持有效运作,这实质上是将大一统的组织分解为多个仍能保持深度互动的小单元。第二,角色分工与核心团队的形成标志着老年学习共同体从松散走向规范。行政驱动型共同体(BY)设立了正副队长、小组长等层级,形成清晰的责任网络,既分担了核心召集人的组织压力,也为成员提供了参与管理的通道。适度的角色分化有助于提升运行效率,但过度制度化的层级设置反而可能抑制成员的自主性和参与热情。因此,结构设计的核心在于寻求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动态平衡。

2. 过程机制:推动成长的核心脉络。过程要素涵盖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学习安排与互动模式,是维系活力、促进成长的关键。第一,特色化学习活动设计是增强成员黏性的重要手段。行政驱动型共同体(BY)通过系统化课程与定期作品展,为成员提供可见的进步轨迹。这不仅印证了学习的效果,更强化了持续参与的自我效能感。第二,知识共享与团体裂变是实现内生性扩展的重要路径。使命驱动型共同体(CC)从一支综合服务队到依据成员兴趣逐步裂变出舞蹈队、非洲鼓队等子团体的过程揭示出一个重要规律:当成员在原有组织中积累了经验、建立了认同后,往往会生发出新的兴趣方向或服务领域。裂变既是对成员自主性的尊重,也为组织注入了持续的生长活力。裂变并非组织的分裂,而是核心使命在不同形式中的延续与深化。

3. 文化内涵:塑造认同的精神纽带。文化要素是老年学习共同体形成身份认同、调节成员关系的深层动力,其影响往往比制度更为持久。第一,共享愿景与组织使命提供方向引领。使命驱动型共同体(CC)以“公益服务”为核心使命,赋予学习活动以超越个人的意义感。这种意义感使成员不再仅仅是“学点什么”,而是“一起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从而将个体兴趣升华

为集体价值。第二,团队氛围与非正式规范深刻影响日常互动质量。兴趣驱动型共同体(BQ)形成“亲如一家”的情感文化,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仍能依靠情感纽带维持组织活力。这种情感文化并非自然生成,而是在长期互动中通过相互关怀、共同经历和仪式化的活动逐步积淀而成。文化内涵与结构特征、过程机制并非孤立存在,规范的结构为文化的生成提供了稳定的互动场域,特色的过程则不断强化着文化的内涵。三者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中观系统的完整图景。

(三)外层系统(组织支持层):组织发展的赋能网络

外层系统指向与老年学习共同体直接互动、提供关键支持的外部组织与关系网络,是其获取资源、赢得认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赋能来源。与微观系统的内生动力和中观系统的内在机制不同,外层系统提供的是一种外部激活。它不直接决定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存亡,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发展的速度、高度与可持续性。该系统的核心在于资源与认同的双轮驱动,二者相互支撑、缺一不可。

1. 资源供给:基础性支持与能力提升。资源是老年学习共同体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与专业基础,其供给的稳定性与适切性直接影响组织的运行质量。第一,稳定的活动场地被普遍视为最核心的支撑条件。物理空间对于老年学习共同体具有多重意义,它不仅是活动开展场所,更是组织从流动聚集走向稳定运作的制度性标识。有固定场所意味着活动可预期、成员可凝聚、外部可对接。第二,适切的经费支持对提振士气与改善条件具有显著作用。经费支持的意义往往超越其实际金额,它传递的是外部对组织价值的认可,这种象征意义对成员心理的激励作用有时甚至大于物质层面的改善。第三,专业培训与能力建设机会是推动组织能力专业化重要外部赋能途径。社区教育机构

提供的专项辅导、技能培训等,能够帮助老年学习共同体突破自娱自乐的局限,在活动设计、组织管理等方面实现能力跃升。这三种资源构成一个递进的赋能链条,场地保障生存,经费改善品质,专业培训则指向长远发展。

2. 关系认同:合法性赋予与社会资本积累。外部认同是老年学习共同体获得社会合法性、增强内部凝聚力的象征性与情感性资源,其作用机制往往比物质资源更为深层。第一,行政认可与身份赋予为草根组织带来根本性的合法性转变。例如,兴趣驱动型共同体(BQ)从“自娱自乐”的团体被正式认定为“老年学习共同体”后,负责人表示“心里有底了”。这精准地揭示了制度性认同的心理效应:它不仅意味着资源获取渠道的拓宽,更使组织成员从“自发聚集的老年人”转变为“被社会承认的学习共同体”。这种身份转变带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是组织稳定运行的重要心理基础。其二,多元主体的社会认可共同构建支撑性网络。家庭的理解与支持可以减轻成员参与的阻力,使老年人能够更安心地投入老年学习共同体活动;志愿专家或智囊团提供的技术认可,不仅提升了活动的专业性,也增强了成员对组织价值的信心;媒体宣传与公开展演则带来广泛的社会可见性与集体自豪感,使成员的付出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回响。这些不同来源的认可相互叠加,显著拓展了老年学习共同体的社会资本。

(四)宏观系统(社会文化层):发展的结构性背景与制度土壤

宏观系统构成影响老年学习共同体发展的最深层结构性环境,集中体现为政策引领、文化观念与社区生态三大维度,共同塑造了组织生长的制度条件与社会土壤。与前三个系统不同,宏观系统的作用往往不是直接的、即时的,而是潜移默化地“框定”了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发展空间、行动逻辑与价值取向。

1. 政策引领:制度合法性与行动依据。政策

环境为老年学习共同体培育与发展提供顶层设计与合法性基础。从国家积极老龄化战略到地方老年教育发展规划的层层推进,为社区开展老年学习共同体培育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与行政动力。例如,Y区管理者在启动相关工作时,即明确援引市级学习型城市建设文件作为指导。政策的引领作用不仅体现在资源投入的倾斜上,更体现在它为基层工作者提供了行动的理由与创新的信心。当某项工作被纳入政策议程后,基层主体便获得了突破常规、探索试错的制度空间。同时,政策环境也塑造了老年学习共同体的身份认知,被政策承认的老年学习共同体往往能够获得更稳定的发展预期和更广泛的社会信任。

2. 文化观念:价值认同与社会心理支撑。社会文化观念为老年人参与老年学习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正当性与心理支持,其影响比政策更为基础、更为持久。随着“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老年人走出家庭、参与社群学习获得日益广泛的社会认同。这种观念转变并非自然发生,而是与人口结构变化、家庭形态转型、积极老龄化话语的传播密切相关。例如,一位受访的共同体成员表示:“退休以后,就觉得生活没有目标了,但是通过参与这个活动,一下子找到了新的方向。”这揭示出老年学习共同体承载着帮助老年人在晚年重建意义感、实现精神价值的重要文化功能。当社会普遍将老年人的学习参与视为有价值的事情而非消磨时间的方式时,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吸引力便会显著增强。同时,文化观念与政策环境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政策的倡导可以推动观念的转变,而观念的变化又为政策的落地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

3. 社区生态:人口结构与空间条件的基础性影响。社区层面的物理与人口构成,为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客观基础。一方面,社区老龄化程度直接影响潜在成员规模。老龄化率较高的社区,老年人之间更容易形成

邻里守望的社会网络,这种熟人社会的基础为老年学习共同体的萌芽提供了天然土壤。另一方面,公共活动空间的可及性是老年学习共同体能否自发萌发与常态开展活动的关键物质条件。空间距离的远近、环境的好坏,往往在无形中完成了对参与群体的筛选。因此,社区生态既是老年学习共同体发展的硬件基础,也隐含着社会分层与资源分布的结构特征。

上述分析表明,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发展受到多层次、系统化的要素网络的影响。本研究构建的四层级生态系统模型,将影响老年学习共同体发展的个体、群体、组织和社会文化要素整合为一个结构化的理论框架,实现了从因素罗列到系统模型的理论跃迁。在这一多层次要素网络中,两大关键杠杆点尤为突出:微观系统的核心召集人与外部系统的活动场地。前者是组织从无到有的灵魂人物,一个有奉献精神和组织能力的召集人决定了老年学习共同体能否萌发并持续运转;后者是组织从生存走向发展的物质保障,一个稳定、可及的活动场地决定了老年学习共同体能否实现常态化运作与质量提升。实证研究表明,这两个要素的缺失或不稳定,是导致许多老年学习共同体陷入停滞的根本原因。这一发现不仅验证了模型的解释力,也为后续干预策略的精准设计提供了明确的理论依据。

五、对策建议:基于影响要素模型的精准干预策略

基于前文构建的影响要素模型及关键杠杆点的识别,本研究从以下四个维度提出促进老年学习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需要说明的是,四项建议并非平行罗列,而是形成“诊断—聚焦—深耕—协同”的逻辑链条:首先通过分层分类实现精准诊断,继而优先保障关键杠杆要素以夯实基础,在此基础上深化软性建设以提升组织韧性,最终构建跨部门协同网络以形成可持续的支持生态。

(一)构建分层分类的精准支持体系

不同类型的老年学习共同体,其发展瓶颈与赋能需求存在本质差异,统一的支持方案往往造成“需要的得不到、不需要的过度给”的资源错配。社区教育机构及相关政策主体应摒弃“一刀切”的支持模式,转而依据影响要素模型对老年学习共同体开展常态化诊断,识别其在微观、中观、外层及宏观各层的优势与短板,实施分层分类的精准干预。

对于兴趣驱动型共同体,其优势在于成员内在动力充沛、情感联结紧密,但资源匮乏、活动场地不稳定、经费不足是其最突出的制约因素。支持策略应遵循“最小干预、最大赋能”原则,优先保障活动场地和小额资金,而非过早导入规范化培训或行政化管理。对兴趣驱动型共同体而言,稳定的物理空间往往比制度化的能力建设更具边际效益。因为它直接回应了成员最迫切的生存需求,而过度规范化反而可能抑制其自发增长的活力。

对于行政驱动型共同体,其拥有体制资源、组织规范、管理有序等优势,但可能面临活力不足、成员自主性弱、过度依赖上级指令等问题。支持重点应放在激活成员自主性、培育自主文化上,避免“以行政方式管理老年学习共同体”的路径依赖。可通过引导建立轮值负责制、鼓励成员自主策划活动、适度下放决策权等方式,逐步实现从行政主导向成员自治的转型,使老年学习共同体在保有体制优势的同时,焕发组织应有的生机与活力。

对于使命驱动型共同体,其社会价值导向鲜明,成员往往具有较高的价值认同感,但也面临公益使命与服务活动的结合机制需要精细设计、持续的服务输出可能使成员产生倦怠感等挑战。支持策略应着重于优化中观系统的“服务—学习”融合机制,在保持公益使命的同时强化学习内涵,通过专业培训提升其服务能力与组织韧性,实现社会价值与成员成长的共赢。

分层分类的精准支持体系,其本质是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的范式转换。通过系统识别与分类干预,推动老年学习共同体从依赖外部资源注入的输血型发展,转向依靠内生动力与外部支持良性互动的造血型发展,从而为积极老龄化提供真正可持续的基层实践载体。

(二)优先保障两大关键杠杆要素

对影响要素模型的分析表明,活动场地与核心召集人是影响老年学习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关键杠杆要素。因此,政策支持与资源投入应优先围绕这两个维度进行系统化设计,实现精准发力、以点带面的干预效果。

在物理空间保障层面,亟须破解“无处活动”的普遍困境。活动场地的缺失或不稳定,是导致许多兴趣驱动型共同体陷入停滞的首要原因。场地问题之所以成为“卡脖子”因素,在于它直接影响了活动的可预期性、成员的参与与稳定性以及组织对外连接的能力。建议由街道和社区统筹协调,建立公共文化场馆、社区活动室、学校体育设施等场所的分时段共享机制,制定清晰的预约使用流程,向老年学习共同体实施公益性开放。可推行“社区学习空间共享计划”,明确管理责任与使用规范,将闲置公共空间转化为可持续的学习支持基地。对于积极开放的场地提供单位,可纳入社区共建表彰体系,形成正向激励。

在核心召集人培育层面,应构建“选育用留”全链条赋能体系。第一,建立召集人发现机制,社区工作者可在日常走访中识别有热情、有威信潜在带头人,早期介入支持。第二,构建系统化赋能平台,社区教育机构可联合高校、社会组织定期举办召集人领导力工作坊,围绕组织管理、活动设计、资源链接、冲突调解等核心能力开展专题培训。第三,建立“导师制”支持网络,邀请经验丰富的召集人进行实务指导,促进实践智慧传承。第四,配套支持包括小额种子基金、基础教学资源包及社区专家智库对接

等服务,降低组织初创门槛。

当然,活动场地与核心召集人并非孤立发挥作用,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稳定的场地可以降低召集人的组织负担,使其从“到处找地方”的奔波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活动内容与会员服务;而有能力的召集人则能够更有效地争取场地资源、提升场地使用效率。因此,在政策设计中应注重两个杠杆的联动推进。可优先选择一批“有场地无召集人”或“有召集人无场地”的社区,进行配对式精准干预,使二者相互支撑、共同发力。通过对关键要素的精准投入,有效降低老年学习共同体的组织门槛,增强其内生发展能力,在社区层面形成一批稳定、活跃、可持续的老年人自组织学习节点。

(三)强化情感与文化的“软性”要素建设

微观系统中成员的情感承诺与中观系统中共享的文化规范是影响老年学习共同体生命力的深层软性要素。培育工作应超越对场地、经费等硬资源的单一依赖,系统构建促进人际信任、情感归属与文化认同的支持生态。

在共同体内部建设层面,应设计促进深度联结的活动机制,强化成员的共同体意识。同时,鼓励老年学习共同体凝练自身的共享愿景、价值规范甚至仪式传统,使其成为凝聚成员的精神内核。例如,使命驱动型共同体可将公益服务日固定为团队文化符号,增强成员的使命感、认同感与归属感。

在跨共同体生态营造层面,社区教育机构可主动搭建交流平台,建立老年学习共同体之间的“邻里关系”,促进经验交流与情感支持网络的扩展,形成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呼应的社群生态。这种横向联结既能缓解单个共同体的资源压力,也能在更大范围内营造积极老龄化的社会氛围,同时也能为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实现学习型社会共同目标做出重要贡献。

在专业支持层面,应将组织文化与情感建设纳入召集人培训的核心模块,提升召集人营造

包容氛围、调解内部关系、培育团队精神的关键能力,使其成为“软环境”的自觉设计者和维护者。

(四)建立跨部门协同的支持网络

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一个多元主体参与、资源高效整合、社会广泛认可的外部生态系统。社区教育机构应从直接提供者转向平台构建者与资源链接者,积极推动形成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支持网络。

在政策与机制协同层面,建立由教育部门牵头,民政、文化、体育部门及街道或社区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会商,统筹区域内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培育规划与支持政策。联合制定社区公共设施面向老年学习共同体开放的实施细则与激励办法,将支持工作纳入相关单位的绩效考核体系。

在资源整合与共享层面,搭建区域性的老年学习资源平台,促进场地、师资、课程、活动项目等信息的互通与匹配。鼓励企业、社会组织通过捐赠设备、设立小微项目基金、提供专业志愿服务等方式进行支持,并建立资源对接的规范化渠道。社区教育机构需主动承担需求汇集与资源链接的经纪人职能,精准对接供需两端。

在氛围营造层面,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展示与表彰机制,提升老年学习共同体的社会能见度与荣誉感。联动地方媒体,讲述老年人通过老年学习共同体实现成长、积极服务社区的故事,持续营造“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友好社会风尚,为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土壤。

综上,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微观到宏观、从硬件到软件、从单一主体到多元协同,全方位进行综合施策。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激活老年人自主学习的组织化力量,为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基层落地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吴峰.从老龄化社会到深度老龄化社会:面向2035的

中国老年教育政策分析[J]. 远程教育杂志, 2025, 43(3): 96-105.

[2] 李光, 赵瑜. 从“老年大学”到“老年学习共同体”——新时代老年教育的新思考[J]. 职教论坛, 2021, 37(6): 103-108.

[3] Yu J, Zhao X Y, Wen S Y.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enior Neighborhood Learning Group: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J/OL].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1-17 [2026-01-12]. <https://doi.org/10.1080/03601277.2026.2615367>.

[4] Putnam R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64.

[5] 王中, 汪国新. 社区学习共同体核心成员的能力建设研究[J]. 高等继续教育学报, 2020, 33(3): 9-14.

[6] Piliiri A, Gravani M N. Non-formal education in later life: An educational, soc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older adults' motivations, goals, benefits, and barriers in Cyprus[J/OL].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1-16 [2025-11-28]. <https://doi.org/10.1080/03601277.2025.2595137>.

[7] 祝琨, 于浩, 董雁. 我国低龄老人学习需求分析与教育策略[J]. 教育与职业, 2024(5): 83-90.

[8] 江颖, 夏海鹰. 边界重塑和关系再构: 分布式领导视野下老年学习共同体的构建[J]. 当代继续教育, 2021, 39(221): 64-73.

[9] 黄美初, 睦依凡. “俱乐部+”老年教育的价值意蕴、自组

织逻辑与实践路径[J]. 职教论坛, 2024, 40(11): 87-94.

[10] 王中, 汪国新. 社区学习共同体的“新资源观”探析[J]. 职教论坛, 2019(5): 102-107.

[11] 汪国新, 孙艳雷. 成员即资源: 社区学习共同体内生发展规律探析[J]. 职教论坛, 2013(24): 38-41.

[12] 汪国新, 项秉健. 社区学习共同体[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5.

[13] 于晶, 熊英, 闫怀品. 社区学习共同体研究综述: 成果与展望[J]. 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2025, 34(5): 1-11.

[14] Bronfenbrenner U. Toward an experimental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7, 32(7): 513-531.

[15] Charmaz K.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M]. 3rd ed.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25: 139.

[16] Glaser B, Strauss A.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M].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18.

[17] Yin R K. Case stud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Design and methods[M]. 6th ed.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18: 293.

[18] Eisenhardt, K. M.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4): 532-550.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Learning Communities

Yu Jing Zhang Xiangyu Jiang Y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and adopting the 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this paper conducts three-level coding and continuou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 of elderly learning communities. It constructs a four-layer influencing factor model. At the micro-system (senior subject level), the core elements are key organizers and community members. The meso-system (community practice level) focuses on structure, operation process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he exo-system (organizational support level) relies on resource supply and achievement recognition. The macro-system (socio-cultural level) covers policy guarantee and social cultural atmosphere. On this basis, targete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 systematic and precise support system, prioritizing the guarantee of key empowering factors,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soft construction of emotional bonding and relational factors.

[Keywords] active aging; elderly learning communities; influencing factors;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栏目编辑: 孙苹)